

# 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

##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谈如何应对当下的全球性挑战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在20世纪70—90年代，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告诉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开放、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现在是中国、印度等国家来要求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巴苏说，“因此，当我听到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对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等都是一个重要且及时的提醒。”

近日，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受邀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表题为《当下的全球性挑战：技术、劳动力与全球化》的演讲。他指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新危机，我们需要寻求一场观念和思想上的革命来应对——“很多人担心，技术的发展会取代一大部分工作。而我的想法是，我巴不得它们替换掉大部分无聊的、重复性的工作，但问题在于，因技术进步取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利润不能仅仅进入少数人的口袋，而应由全民所共享。”

多年来，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2009年12月，与印度总理辛格35分钟的交谈，让巴苏决定接受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巴苏参与了印度新一轮加速增长的政策制定。而后，他又被世界银行聘为首席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些参与实际政策制定的经历，让巴苏的经济学思考不是孤悬于思维实验中的逻辑推演，而能够直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考希克·巴苏 (Kaushik Basu)，印度裔经济学家，曾在印度从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 C. Mark 讲席教授。2009年12月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任期两年半。2012年9月—2016年9月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巴苏

料，发现当时英国童工的比例特别高，但那时使用儿童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纺织厂要引进一批机器，号称一台机器能替代好几个工人的工作量，并且只需要几个6岁的孩子就可以操作，许多人很认真地追问‘真的6岁的孩子也会操作吗’，可见当时即便是6岁的孩子工作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他还提到：“那时童工每天工作14小时是常态，议会在举行听证会时问一名儿童‘你每天工作这么久有没有累倒’，对方说‘我每天工作完就会有这种感觉，有时甚至走着走着就摔倒在路上’。”正是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举行的听证会，英国关于保护童工的相关政策法规才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而这一过程中人们才慢慢意识到雇佣童工原来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才使得后来英国的童工比例快速下降。

“所以，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所经历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在思想上的革命程度也是非常剧烈的。而现在，我们也需要一场这样的革命。有些想

(下转3版) ➔

### 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巴苏谈到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美国的反垄断法，另一个则是工业革命。1890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即《谢尔曼法》。该法案设立的最初目的是防止垄断，要求同一行业中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企业来形成相互竞争。该法案是基于这样的经济模型：在同一个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越多，消费者越能以接近成本的价格购买到同

样的商品。但人们后来发现，该法案的一大问题是会使美国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降低。于是，到了1918年，《出口贸易法》应运而生，当商品只用于出口，仅仅面向国际市场时，是可以让国内的这些企业进行整合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形成托拉斯(垄断)的。

在巴苏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垄断形式与过去《谢尔曼法》颁布时的存在天壤之别，“如果说以前市场上有100家不同的汽车企业，但现在这100家只生产汽车的某一个零部件。”巴苏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分拆”模式反而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垄断，商品的价格会更高，而能接触到这类产品的消费者反而会更加少。这意味

着《谢尔曼法》在今天已经失效了，现在已经不是由一个企业生产完整的同类商品，生产的纵向分拆(外包)使得公司越多，垄断则更严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天我们要防止垄断，为社会谋求更多福利，需要更新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关键不是在于要保证多少数量企业的竞争，而是要确保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润不是被少数的技术所有者占有，那些被技术所替代的劳工们也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苏提及了美国经济学家马丁·魏茨曼在1984年提出的“分享经济学”，借助魏茨曼的主张他指出，为了防止垄断和利益向少数人

集中，反托拉斯法应该变成有关持股(share-holding)的法律，让利润由全民共享——“反垄断法应该被取消，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共享经济下，虽然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享受更高的福利。”这一想法固然美好，但如何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予以落实？在巴苏看来，这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认为许多国家的“渐进式税收”就是非常好的尝试，但具体的细节如何落实，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努力。尽管具体的措施亟待完善，巴苏仍然强调观念转变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他以工业革命为例：“在研究童工问题时，我特别考察了工业革命时期有关童工的历史资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